

第十一章

协和会与文化专制

伪满政权的“精神母体”

伪满政权出笼后，关东军的石原莞尔参谋和簇拥其周围的满洲青年联盟和大雄峰会的成员认为，实行殖民统治光靠暴力不行，还必须辅之以思想政治统治。1932年4月1日，在石原的支持下，经原伪自治指导部成员山口重次、小泽开策等人积极策划，在奉天满铁附属地的日本忠灵塔前举行了结党宣誓，成立了协和党。协和党既标榜反对资本主义，又排斥共产主义，一心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是地道的法西斯政党。它利用青年联盟的固有系统发展组织，并以“宣抚”之名，追随关东军的血腥“讨伐”与镇压，进行了各种政治阴谋活动。但是，关东军是坚决反对作为一种相对独立政治力量的政党存在的。尽管石原在关东军内是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个人主张也不能全部化为全军的政策。日本帝国主义经营伪满洲国的总战略，乃是“准备以太平洋为中心的世界争霸战”。^①日本为了把自己置于“东亚的王者”的地位，同欧美抗衡，需要用更加具有广泛性的政治团体，争取和控制极为广大的群众。即使仅从眼前着想，由于正在集中力量实行

^① 小山贞知：《满洲国协和会的发展》，1941年，中央公论社出版，第38页。

所谓“治安第一主义”，面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日趋高涨的紧迫形势，日本侵略者也感到急需一个能够配合军事“讨伐”和政治镇压，从思想和政治上统治群众的所谓“思想的教化的组织”，而不是由法西斯“精锐”所构成的政党。于是，由关东军的另一名重要参谋片仓衷出面，开始筹建协和会。以创立委员身份参与策划的，除片仓衷本人外，原协和党人亦被吸收，还招纳了几名汉奸以做点缀。他们是：板垣征四郎、张燕卿、谢介石、于静远、阮振铎、小泽开策、和田劲、小山贞知、山口重次等。1932年7月25日，在关东军司令官、伪满执政、满铁和关东厅首脑人物亲自参加下，于伪满国务院宣告协和会成立。溥仪任协和会名誉总裁，本庄繁任名誉顾问，郑孝胥任会长，张燕卿任理事长，谢介石任中央事务局长，中野虎逸任中央事务局次长。协和会虽然取代了协和党，但是换汤不换药，大雄峰会员、青年联盟盟员以及原伪自治指导部成员还是骨干。推出的几名汉奸，无非是招牌，且系过渡性安排。

协和会是伪满时期的殖民统治机构之一，所以它的推移演化是受伪满政权的动向制约的。随着伪满各级政权中日本人官吏势力的不断膨胀，和中央集权统治的日趋强化，协和会作为直接的殖民统治机构的性质愈益浓厚。1934年8月伪满实行帝制，9月协和会也随之改组，伪国务院总务厅次长阪谷希一取代山口重次，兼任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与此同时，协和会其他首脑人员也几乎全部改由伪满政府中的日本人官吏兼任。协和会与伪满政府开结实行“一体化”。1934年12月，南次郎接任关东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接任关东军参谋副长之后，关东军进一步加强了对协和会的控制。1935年9月，原由汉奸担任的协和会中央事务局长，也改由日本人平岛敏夫担任。1936年2月，在协和会中央事务局内还设

立了以半田敏治为委员长的协和会事务局，从此开始在伪满各机关、各会社建立协和会分会。同年，拥有四五万名成员的日本法西斯右翼团体“大满洲正义团”也与协和会合流。“正义团”成员复杂，“团员不良行为频发，酿成各种事端”^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无恶不做的黑社会法西斯流氓集团。协和会与“正义团”合并，也反映了它的反动本性。

1936年7月25日协和会出笼四周年，值此时刻又实行了第二次大改组。名称改为满洲帝国协和会；人事方面：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任会长，原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伪满参议府参议井上忠也任中央本部长，平岛敏夫任中央本部总务部长。^②此次改组的实质，是把协和会进一步明确地规定为“国家机构的团体”，具体地说，就是将协和会作为“以指导民族引导被指导民族为主要目标的国家机构的团体”。这里所说的指导民族自然是指实际控制和操纵着伪满政权的日本人了。

1932年协和会成立时和1936年协和会改组时，溥仪按日本人的指挥棒先后颁布了《训词》和《敕令》，两项文件用词委婉、含蓄，但说的是一个意思：建立协和会是为了思想统治。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比溥仪直截了当，他在1936年7月23日的协和会第三次联合协议会上的《训词》中明确地提出了“统一民心”的问题。至于协和会作为“国家机构的团体”具有什么性质、同伪满政权又是什么关系？1936年9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其特别发表的《满洲帝国协和会之根本精神》文告中做了回答。

① 伪满洲国协和会东京支局：《对大满洲正义团的考察》，1935年9月10日，打印件。

② 1937年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改为桥本虎之助，总务部长改为日本浪人出身的伪满警察头子甘粕正彦。当时，协和会监查部长和田劲也是日本浪人出身，协和会顾问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和井上忠也等。

文告说，协和会是与伪满洲国“俱生俱长”的，它是“护持”所谓“建国精神”，“训练国民”，“并实现其理想之唯一无二的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组织”。关于协和会和伪满政府的关系，文告解释说：“建国精神之政治的发动表现，须依据满洲国政府，至其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则须依据协和会”。所以，“协和会既非政府之从属机关，又非对立机关，乃政府之精神的母体也。”^①那么，又有何必要在伪满政府之外成立一个协和会这样的国家机关性质的团体呢？第一、伪满洲国被打扮成“独立国家”，实际却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附庸，这就需要一个能量颇大的大喊“日满一德一心”的庞大宣传机器；第二、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是以“王道”之名而行殖民统治的霸术的，所以在进行法西斯统治的同时，“必须研究缓解由于权力的重压而产生的各种政治的社会的摩擦的一些方法。”^②

协和会最大限度地从思想上政治上控制和统治人民群众，从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广泛地网罗会员。因此，协和会基层组织——分会，有单位分会、行业分会，也还有民族分会，甚至在伪军中还建立了分会。至于地方分会，哪里人民抗日斗争高涨，哪里的协和会组织就特别膨胀。如磐石县，1935年全县人口为13万人，协和会组织率达1%，有12个分会，6个联合会，1个县联合分会，179个村分会。^③至于全伪满洲国的情况是，截至1937年末，共有2608个分会，814897名会员。^④协和会领导机关有：中央本部、省本部、市县旗本部。

① 关毅编著，《国民道德参考资料》，1938年，第79页。

② 阪谷希一，《满洲国与协和会》，日伪档案，（一）475号。

③ “关于伪满协和会”，日伪档案，（一）475号。

④ 《满洲国现势》，1938年版，第130页。

协和会的活动极其广泛，首要的是竭力进行所谓“建国精神”和“国家观念”的宣传，驱使人民群众服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为其效劳。其次是所谓“宣德达情”，其具体化和组织化就是协和会的联合协议会。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在谈到协和会时曾称：“勿效议会政治之弊，勿陷专制政治之弊”。^①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搞议会政治是真，而不实行专制统治则纯属谎言。按《协和会章程》，联合协议会分为全国、省、市县旗三级和支部，都被称为“宣德达情”机关。协和会骨干份子小山贞知曾经解释说，“宣德达情”“其真意不能解释为上意下达、下意上达。还是解释为宣扬德、上达情最为妥当。”他还说：“宣德就是宣扬这种帝德，而达情则是将奉仰帝德的草民的心情上达”。^②说穿了，就是想方设法迫使殖民地的黎民百姓服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摆布。所以，实践“宣德达情”的联合协议会，其活动的中心便是“使民众周知政府的施策、搜集民间的不满，并协助政府消除之”。^③唯其如此，协和会联合协议会的构成、议事办法和会议结果处理等都极其特别，不伦不类。以市、县、旗联合协议会为例：出席者是各分会代表和伪政府以及其它单位人员，但分会代表并非是民主选举产生，而是分会领导机关决定的；议案虽由分会提出，但议案整理委员会可以各种理由拒收或撤销议案；议案处理不做表决，而由议长根据所谓“建国精神”进行“裁定”，会议决定事项虽均分别传达给各有关机关，但任何机关对决定只负有“道义责任”，并非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① 关毅编著：《国民道德参考资料》，1938年，第76页。

② 小山贞知：《协和会的发达》，第48～49页。

③ 伪满治安部参谋司农田事务官：《北安地区治安肃正献策》，1940年8月2日齐齐哈尔宪兵队呈实敏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竹内宽函，齐宪高第317号。

帝国主义的主观愿望和殖民地的客观现实，往往是两回事。协和会所进行的“精神工作”和“宣德达情”活动，除极少数民族败类外，在反侵略意识强烈的广大群众中间究竟产生什么效果，值得研究。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当时的东北人民都把协和会唾骂为“蝎虎会”或“协和坏”，由此不难窥见人民群众厌恶与痛恨协和会心理之一斑。这是协和会自身的罪恶所使然。特别在反共和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方面，协和会成了日伪军警宪的一支别动队，其罪行也是罄竹难书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还是可以把协和会和德国纳粹党、意大利的法西斯蒂比照一下的。

民族离间与分治

协和会所标榜的“民族协和”，被日伪称之为所谓“建国精神”之一。实际上，日本侵略者以“协和”之名，行离间之实，通过民族分治而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

日本侵略者首先鼓吹日本民族核心论，说“民族协和”是以日本民族为“核心”的“五族协和”。事变以来，日本人竞相涌入我国东北。1931至1937年，日本侨民从20万增加到40万人以上^①，此后也剧增不已。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普通的劳动人民和中下层官私职人员。甚至也还有的是受日本统治者的逼迫，而不得不流到伪满的。但也不能不看到，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其统治，极力用对外民族的侵略来掩盖和缓冲国内阶级矛盾，而在伪满他们

^① 据《满洲国现势》。1938年版载：1937年4月日本人为39.7万人，1937年7月为42万人，1937年10月为44.5万人。

则使日本民族在各方面都处于优越的特权地位。事变前，日本通过不平等条约和既成事实，使日本侨居我国的人民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政府及其法律的约束和管辖。伪满洲国出笼后，日本侨民一变而为伪满的民族之一，大量日本人纷纷充当了伪满各部门的首脑、官吏和职员，操持了伪满各方面的全权和实权。在这种情况下，“治外法权”已无实质意义。所以，“治外法权”的“撤销”，与其说是取消日本人的特权，勿宁说是扩大特权，或者说是使日本人所获得的权益全部合法化。又何况，治外法权“撤销”后，在伪满的司法与行政上公开保留着特权；而且，在教育、兵事和神社等方面，日本人根本不受伪满法制约束。

伪满洲国出笼以来，“日满一德一心”已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口头禅。可是，在民族关系上却鼓吹民族“优劣论”。中国各族人民被诬为“不法、无知、愚昧”，而日本人则被吹嘘为“富有优秀质量和卓越能力”的“大和民族”。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意志是把日本民族摆在“核心”的指导地位。可是，这种人为的优越感和特殊化，不能不导致民族压迫问题的尖锐化。曾任伪满协和会首脑之一和祭祀府总裁的桥本虎之助公然声称，日本人“他们是站在现代文化最高峰的民族，所以立于指导地位也是当然的。”然而，他又感到理亏，所以主张日本人的“指导地位”不能暴露，就像肉体与骨骼的关系，作为骨骼的日本人“跑到肉体外边，那就不好看了。”问题是，被比作骨骼的日本民族，当时是征服者、侵略者、压迫者、掠夺者，他们同殖民地人民根本不是什么骨肉关系。日本人当时所强烈表现出来的不单是个人意志，而是殖民政策的必然体现。桥本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的横行霸道的事实：“在某公园里，有一个日本人犯了规则把自行车带到公园里来，叫一个满人园丁看见指问了，可是那个日本人不但不受质

问，反而夺去了园丁的扫帚，把园丁打个落花流水。”^①当然，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不单是民族优越感和欺凌打骂之类的问题。强调以日本民族为“核心”，是宣布日本人是伪满的主宰。

亘古以来，我国东北地区都是汉族和其他民族共同开发和生息、繁衍的地区。可是，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彻底吞噬这块土地的目的，竭力篡改历史。而且，这种篡改由来已久，不惜工本。日本统治阶级善于利用精神力量，在历史问题上大做手脚也有其传统，从事这种丑陋政治行径的史学权威也不乏其人。而且，事实证明，日本侵略者篡改我国东北历史，不仅仅限于几本著作和若干演讲，伪满的各种教科书和一些出版物中，都充斥着这种篡改。篡改历史是日本的“国策”，目的是把东北从中国割离出来。问题还不止于此。篡改历史，也是为了制造“自古以来日满就有关系”，伪满是“一君万民的日本国体的发展”和“日本国国土的延长”等历史谎言，为使中国人亡宗灭族准备条件。而在民族关系上，日本侵略者篡改历史，乃是为了制造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对立，实行离间和分而治之的“高等”民族政策。

在我国东北，汉族是人口占多数的民族，政治上、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血缘上与关内占多数的汉族有直接关系。日本帝国主义急于屈服的首先和主要是汉族。如何对待汉族，是日伪实行民族政策的中心环节。在经济上，由于汉族人口居多，力量较强，不能予以漠视；但在政治上，则明显地实行遏制和孤立政策，特别在人事上则做更多的戒备。

满族和汉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优劣论的眼里，同被视为劣等民族。满族和汉族的广大劳动人民，同样被践踏在日本侵

^① 伪新京特别市社会事业联合会：《新京社会事业》，第4～7页。

略者的铁蹄之下，遭受着巨大的民族灾难。问题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吞我国东北的过程中，在政治上一贯地充分利用了与清皇室有着血缘关系的满族上层份子，或满族统治阶层的其他份子和汉奸份子。日伪对满族上层不但特别垂青，且给予特别待遇。在沈阳还设立了维城国民高等学校，专收皇族子弟。伪皇宫的护军和警卫连等自然也以满族为限。

朝鲜与我国只一江之隔，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往来就很密切。事变后渡满的朝鲜族激增，由事变前的每年平均1.5万人增加到4万人，到1937年估计已达80万人。^①朝鲜人民大量渡江来满的主要原因，是不堪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与压迫。渡满朝鲜移民的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官公吏和工商业者极少，从地区分布上看主要在南满。^②朝鲜族人民，无论是居住在朝鲜本土者还是渡江来到我国东北者，都是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压迫的殖民地人民。只因1910年日本吞并了朝鲜，故日本称朝鲜人是“本质上”的“日本人”。在伪满的人口统计上，虽把朝鲜族当作日本人口，但与日本人相区别，将其称作“半岛人”。实际上，在伪满，无论政治上、经济上，朝鲜族和日本人都不能同日而语，地位根本不同。“本质上”的“日本人”主要是指朝鲜族的上层而言。因为朝鲜族向来是反帝意识很强的民族，日本侵略者为从政治上巩固其统治，极力强调其“净化”和“自净”，为此就要依靠朝鲜族的上层，扶植其为“核心的指导阶级”。^③在经济上，

① 朝鲜移民多种水田，流动性大，人口数量不确。《满洲国现势》，1938年版，到1937年1月，在东北的朝鲜族人口为85.9万人。

② 满铁产业部，《在满朝鲜人实情》，1937年2月，秘，打印本载：朝鲜族居住在伪间岛省占56.4%，伪奉天省占13.4%，伪安东省占11.0%，其余各省均在10%以下。

③ 关东军司令部，《在满朝鲜人指导要纲》1938年12月25日。〔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小学馆书房，第956页。

日本侵略者对朝鲜族实行的是，既榨取又利用的两面政策。例如，日本侵略者针对朝鲜族多以水田为生的特点，对在满的朝鲜族实行一种称为“创定自作农”的政策。“自作农”即“自耕农”，而“创定”即扶植、树立之意。这种政策，通过东洋拓植会社和满鲜拓殖会社办理。他们帮助朝鲜农民获取土地，不必支付现款，地价和契税统由会社贷款，利息8厘至1分，以15年为期还本付息，领得地契，取得土地所有权。日本侵略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在朝鲜族农民中扶植起比较富裕的中农阶层，使之成为实行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而在被扶植过程中，朝鲜族农民遭受殖民会社的残酷剥夺。其结果又加剧了民族矛盾，使被剥夺土地的汉族或其他民族，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某种程度上转嫁到朝鲜族身上。日本侵略者如此进行朝鲜移民，还怀有军事和政治目的。所以，关东军强调：“对朝鲜人农业移民，根据军事和其它需要，适当统制指导”，“在满朝鲜人担任满洲国内的治安维持、并逐步担负国防职务。”^①

我国东北地区的蒙古民族，伪满时期人口不足100万人，但却分散在从大兴安岭到锦热一带，占伪满面积三分之一的广大地区。蒙古民族性格强悍，内蒙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日本帝国主义对之采取了一整套特殊政策。要害在于“以兴安蒙古作为对蒙政策之推进基地”。^②也就是以内蒙地区为基地，西进蒙苏，南侵中国大陆。这是早经确定、并在事变前即“默默进行”的侵略方针。所以，不管是关东军内蒙特务机关的特务，还是伪满洲国从

^① 关东军司令部：《在满朝鲜人指导要纲》，1938年12月25日。〔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みすじ书房，第956页。

^② 向野元生：《对蒙政策之根干》，《满洲国政指导综览》，1944年，第131页。

事内蒙地区殖民统治的日本参事官们，全都是在“为使战马奔向帕米尔，必须驯服蒙古人”的嚣张口号下，从事其侵略活动的。

为此目的，日伪对蒙古民族的基本政策是：维护内蒙原有制度，利用蒙古王公贵族继续对蒙古族人民进行统治；离间蒙汉民族关系，竭力把蒙古民族的强悍性格利用于镇压反抗和对外侵略。^①

蒙古民族的社会制度和群众习俗，封建性质极为浓重。统治阶级是王公、贵族和喇嘛。王公贵族把持着盟长、旗长、协理等一切重要职位，是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者，握有极大特权，甚至蒙旗租税都可任意挥霍；喇嘛以宗教为绝对权力而成为统治者，自然喇嘛也分为贵族出身的为所欲为的喇嘛，和奴隶出身的沦为高级喇嘛奴隶的喇嘛；平民即自由民，从事放牧或农耕，勉强维持生活；奴隶则完全隶属于王公贵族，没有任何权力和自由。

日本侵略者离间蒙族同其他民族的关系，口号是：“满洲是满洲人的满洲，蒙古是蒙古人的蒙古”；政策是：实行民族分治。如前所述，伪满傀儡政权成立，从伪中央到地方，内蒙都实行特殊行政。1936年对伪热河省和锦州省的蒙政，还采取了“属人主义”，同一地区设立县、旗双重行政机构：旗管蒙族；县对蒙族以外的各族施政。自然，实行蒙族特殊行政，只是让王公贵族充当头面人物，并非真正实行民族自治。因为蒙政实权操在日本人次长、参与官和参事官手中。不过，自1935年奈曼旗事件发生后，日本侵略者怀柔和利用蒙族统治阶层的政策倾向更加明

^① 1933年7月16日关东军的《暂行蒙古人指导方针要纲案》和1936年5月20日伪满洲国炮制的《蒙古民族指导根本方针》，都以此为主要内容。

显了。奈曼旗是1934年由伪热河省绥东县划为伪兴安西省蒙旗的。^①1935年7月8日，汉族周荣久起义，集800人攻打县城，参事官山守英治等数名日本人官吏被击毙。事后，新任旗参事官根本龙太郎了解到，当时蒙族、包括旗长在内都站在周荣久一边。后来，伪兴安西省警务厅派出的以磐井文雄为首的400人警察队追击了周的起义队伍，周本人最后也被处以极刑。但是，奈曼旗新任日本人参事官却大幅度地调整了旗政，恢复了原来行之于蒙族的努图克制。^②阿鲁科尔沁旗参事官鸟村三郎还利用蒙族群众绝对信赖喇嘛的心理，组织喇嘛委员会，怀柔蒙族上层，控制蒙族群众。但是，蒙族王公贵族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的。前面已经提到的1936年4月发生的凌升事件就是例证。尽管这一事件的内幕至今尚未完全揭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对蒙族上层造成普遍的恐怖，而这正是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所在。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安排，反正凌升等人被杀的1936年4月24日，西蒙为推进伪蒙古军政府成立的第一次蒙古大会，在乌珠穆沁旗召开。急忙赶去参加会议的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一下飞机就向与会者通报了凌升已被处决的消息。德王曾经回忆称，凌升事件后，蒙古王公都守口如瓶，明哲保身，采取应付场面的态度。

关于将蒙族强悍性格利用于武力镇压和扩大军事侵略的图谋，早已开始，但是见诸于明文政策，则始于1935年12月27日日本参谋总长下达给关东军司令官的《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其

① 原属昭乌达盟，王府在大沁塔拉，旗长是达那不达尔吉亲王。

② 每旗分10个左右努图克，其首长称努图克达。下分嘎查和爱里。聚居5000人的地方称街。街长、努图克达和助理员由旗长任命，旗发工薪。爱里达由努图克达任命。

中规定“得将满洲国陆军中蒙古骑兵等一部逐步使用于外征”。^①至于具体行动，早在1932年11月关东军围剿苏炳文、张殿九起义军时，兴安伪军就充当了帮凶。1935年1月，伪兴安北警备军还被派遣参加所谓夺还哈尔哈庙的作战。更大规模地利用兴安伪军于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还是“七七”事变以后的事情。

教育事业蒙受摧残

文化教育也是日本侵略者推行殖民统治的重要领域，他们为此而大做文章。

事变前，我国东北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水平也有相应的提高。当然，四省情况颇不平衡，差距较大。就中等教育而言，辽宁省可与广东、江苏并驾齐驱，名列前茅，吉林省属于中间状态；黑龙江、热河两省比较落后，属于下游。事变前夕，东北四省加东省特别区，共有小学13000余所，小学生80余万人；中学330余所，学生26000余人。^②但是，事变后，不但教育大权被日本侵略者所夺得，而且由于日本武装侵略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日伪推行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使业已走上发展之路的东北教育蒙受严重的摧残与破坏。到1933年5月，总数13324所中小学中，复课者为7928所，仍有5352所关闭。^③特别是小学，40%以上停课。尤其吉林和热河，中小学大都在停办。伪满前半

① 【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みすぢ书房第947页。

② 满铁地方部学务课：《中国的教育制度概要及东北四省的学校教育概况》，1931年4月。另据伪满文教部《第一次满洲帝国文教年鉴》载，事变前小学为14330所。

③ 伪满国务院统计处编《第一次满洲国年鉴》，1933年刊行，第291页。

期，伪满的殖民统治重点，始终是贯彻“治安第一主义”。特别在抗日军比较活跃的山村，日伪当局为了进行“讨伐”镇压，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对文化教育更不屑一顾。因此，直到1936年，中小学仍未恢复到事变前的水平。据伪满文教部统计，截至1936年8月，全伪满虽已有13245所小学，已达事变前小学总数的96%强，但恢复状态较好的是日伪统治的中心地区，即原属辽宁省的伪安东、奉天、锦州三省，其它各省只恢复到事变前的60~70%。还必须指出，已开学上课的中小学，民间出资的村立和私立小学占很大比重，尤其小学占近70%。^① 人民群众为不使孩子辍学，不得不节衣缩食，自力办学。因此，开学上课的学校，大都非常简陋，多数是只有一位教师的“私塾”。

摧残教育的无形因素，是殖民主义教育政策。在日本侵略者眼里，原有教育设施“成了排日之地方轴心”，是“排日干部之养成所”。^② 故处心积虑予以改变。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决定《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写道：“关于满洲国民的教化，着眼点是使该国国民自觉到该国同帝国的不可分的关系……把力量倾注于劳作教育，振兴实业教育。”^③ 由此可见，通过教育，不仅要使中国人民“自觉”即甘心依附侵略者，成为亡国奴，而且经受“劳作”、“实业”教育，充当掠夺工具和盘剥对象。作为关东军的殖民主义决策工具的满铁经调会第五部教育班，根据上述“要纲”曾经炮制了相应的教育方针，和以实业教育为主、修业年限缩短的教育体系。但是，教育体制的改变，牵扯很大，难以一蹴而

① 以上数字见伪满文教部学务司，《康德三年度学事统计》。

② 伪满文教部编：《第一次满洲帝国文教年鉴》，1938年版，第476页。

③ 《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第13条所载。〔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590页。

就。本书在后面将要述及，伪满学制的重大变化，发生在1937年。在那之前，主要是向教育内容开刀。1932年3月25日，伪满国务院以院令第2号公告：“嗣后各学校课程暂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之。”^①同年7月，伪满文教部还急忙设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编纂教材。但远水不解近渴。作为权宜之计，伪满文教部命令小学暂用日本小学教科书，和事变后伪奉天省教育厅临时胡乱编造的教材；中学因无其它教材可暂用，继续使用原有教科书，但须删改，进行所谓“取舍选择”。对此，日本侵略者极不放心，竟动用宪兵检查教材。1933年7月，1名来自哈尔滨的中学二年级学生因携带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模范读本》而在长春被日本宪兵逮捕，理由就是书中有关于青天白日旗、华盛顿、林肯、美国国体、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记述。^②对于这些，日本侵略者竟畏之如虎，“严加取缔”。可是，伪满文教当局要想用自编的教科书敷盖整个教育阵地，至少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于是，伪满文教部门三令五申，必须使用其它教材者，须经伪文教部批准。1935年1至11月被禁止使用的教材即达156种。^③诸如：樊炳清《修身要义》（商务，1913年版）、王炽昌《新师范教育》（中华，1922年版）、许国英《国文读本》（商务，1914年版）、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中华，1928年版）、严济慈《现代初中教科书——算术》（商务，1923年版）等，都在被禁之列。^④

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培养顺民，惟恐青年学生提高民族

① 伪满国务院统计处：《第一次满洲国年报》，第289页。

② 1933年7月14日新京宪兵队长小山弥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桥本虎之助报告，新宪高第64号。

③ 伪满文教部：《第四回教育厅长会议记录》，1935年11月，第9页。

④ 伪满文教部：《文教月报》，第4号，1935年11月20日，第16~22页。

意识。在中小学不但将修身、伦理、经学作为必修课，而且宣称“孝悌、敬老、怜贫”、“俭、勤、信、恕”、“智、仁、勇”等是各级学校的教育宗旨。这些思想行为本身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日本侵略者的居心，是蒙蔽青少年，达到奴化的目的。为此目的，还急忙把日语列入教学。高小第一学年，日语即必修课。至于初高中和师范，日语是各年级必修课，教学时数不得少于国语。

伪满时期，高等教育同样遭到摧残，而且情况更惨。事变前，我国东北高等学校发展之速，中外瞩目。从1911年8月英国人司督阁在沈阳小河沿创办辽宁医学专门学校（后改盛京医科大学）起，到“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高等学校已发展到30余所。其中，1923年由张学良亲自创办的东北大学，是闻名遐迩的东北最高学府。校园宏大，建筑雄伟，设有文法、理工、教育、农学4院、19系和公民史地专修科与预科。然而，所有这些教育设施却毁于“九一八”事变的炮火。师生相率流亡，图书失散无存。“沈阳事变以来，以东北大学、冯庸大学、萃升书院等各处藏书散失颇多，城坊书摊俯拾即是。”^①由张作相任校长的吉林大学亦然。“教授多南人，亦相与俱去，学生亦因之四散”，故“无”学之可能。^②总之，国破家亡，学校荡然。直到1936年8月，被伪满文教部门列为高等教育设施的也只有8所，学生1600余人。^③而且，其中主要是教会学校、私立学校或短期训练机关。

① 伪满文教部：《满洲帝国文教部第二次年鉴》，1935年12月刊，第411页。该年鉴载：沈阳故宫博物馆和东北大学藏殿本书，不下400种，45000册。

② 伪满文教部：《第一回教育厅长会议记录》，1932年，第8页。

③ 伪满文教部学务司：《康第三年度学事统计》。

就在普通高等教育一片秋风萧瑟之际，一所特殊教育机关却受到日伪当局的青睐而独领风骚，它就是伪满时期闻名的大同学院。其前身是伪自治指导部训练所。伪满政权成立后，自治指导部被撤销，其活动与人马全由伪国务院资政局所继承，训练所也随之由沈阳迁至长春。伪资政局长和训练所长都由原大雄峰会成员笠木良明担任。他与当时的伪国务院总务厅长驹井德三意见相左。关东军支持后者。1932年6月伪资政局遂被撤销。同年7月11日伪满国务院又以教令第60号公布了大同学院“官制”，训练所在所训练生一变而为大同学院的首批学员。驹井德三兼任了院长。大同学院是伪满官吏短期训练机关，而非科学理论的系统教育设施。为了训练服从精神，还进行“近于军队”的训练。大同学院直接隶属于伪满国务院总务厅，伪文教部无权过问。1934年大同学院机构改革时，改为由伪国务总理大臣直辖，但只是形式。改变隶属关系的目的，在于建立以大同学院为首的伪满官吏训练体系。从同年起，大同学院院长被授以统辖、指导伪满各部局、各省的职员训练所和警察学校的权力。同时，大同学院除为伪满政府训练官吏外，也开始为协和会、社会团体、特殊会社以及其它机关训练职员。1936年，屠杀、镇压我国人民的刽子手、原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预备役中将井上忠也任院长；曾任台湾守备队副官和关东军副官的预备大佐恒吉秀雄任学监。

事变后，中国人的教育设施和日本人的教育设施，呈现鲜明的反差。后者迅速发展，急剧膨胀。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以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为基地，主要由满铁大肆进行文化侵略，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举世注目。满铁自创办之始即根据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所鼓吹的“文装武备”论，推行“以王道之旗而行霸术”的侵略方针。满铁所办的教育，既有中国人教育，又有日本人教

育。对于前者，主要“使他们了解日本的情况，培养将来可能成为日中之间联系的纽带人物。”^①对于后者，其教育目的，除使日侨安居于我国东北外，主要是培养推行大陆侵略政策的人才。截至1931年，日本人初等学校，即寻常小学和寻常高等小学共36所；中国人初等教育设施，即公学堂共10所；日本人中等教育，有中学校4所，女子高等学校4所，此外还有长春商业学校和奉天南满中学堂，后者也招收中国学生；高等学校有大连的南满洲工业专门学校、满洲教育专门学校，和奉天的南满洲医科大学，此外，还有幼儿园26所，补习教育设施60余所。这套教育体系全都布设在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同时满铁还资助了附属地外日本人开办的几十所学校。^②事变以来，日本人蜂拥而至，以附属地为中心的日本人教育急剧膨胀。附属地以外的日本人小学，也已逾百，并从1936年8月起，统由满铁“委托经营”。中等教育，到1937年，日本人中学校由4所增加到7所，高等女子学校由4所增加到11所。

在伪满洲国还有个比教育更大的概念——教化，它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活动。因此，不管是原来的伪文教部还是后来的伪民生部文教司，都设有分管这3个方面的机构。关于社会教育，日本侵略者也是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利用原有设施，为殖民统治大唱赞歌，玩弄“右手持凶锋，左腕挂念珠”的一贯伎俩。事变前，辽宁省的社会教育设施比较发达，在全国属于中间偏上水平。事变后一时陷于瘫痪的社会教育设施，很快沦为日伪宣传工具。到1935年，作为综合社会教育设的民众教育馆，到

① 满铁档案：甲种，总体，监察，监察意见书，2—2，第22号。

② 满铁：《昭和六年度统计年报》，第832~835页。

1935年为72所。但除省城和特别市者外，其余“效率殊欠敏活”，徒具虚名。全伪满的图书馆，约有60余处，多为县立，“设备苟简”，能为日伪鼓吹“王道”者为数甚少。当然，被收罗在奉天图书馆的珍贵典籍，为数较多，但伪满期间它却成了侵略者任意摆布的囊中物。^①至于博物馆之设，是1935年在没收汤玉麟在沈阳的房产基础上实现的。^②

孔孟的儒家思想，渊远流长，中外影响深远，是东方悠久文化的精华，不能否定。但是，日本侵略者鼓吹孔孟之道，完全是为了愚弄群众，是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日本侵略者正是在宣扬孔道之后，又转而鼓吹“惟神之道”，妄图更改中国人民的“祖宗”。如前所述，孔孟之道首先用于学校，目的是用四书孝经排除三民主义的党义教材。明令祭孔，始于1932年秋，同年9月23日，溥仪竟也出现在孔庙，顶礼膜拜。从1933年起，各地统一礼节：都得行跪拜礼；主祭官得着用“蓝袍青马褂”，陪祭官“均用缎靴因秋帽”。同时还招收中小学生，授以“宫殿宴飨之乐”，和“羽龠之舞”，以备祭孔时“充作乐歌舞工，铿锵鼓舞”。总之，复古之风大作，汉奸傀儡丑态百出。

当时，孔教总会设在沈阳故宫内，此外哈尔滨、延边设有孔教会，30余县设有分会。但孔教只是伪满“教化”团体之一。其他宗教也无所不有。主要的也还是三大宗教。据伪满1932年末调

① 据伪满文教部《满洲帝国文教部第二次年鉴》载，奉天图书馆的藏书，除故宫文溯阁的《四库全书》外，来源有5：张家448种15684册，东北大学776种，22426册；萃升书院438种，12410册；故宫博物院358种，34428册；冯庸大学65种，3395册；赠书900种5000册，档册2000册，档稿50000件。后来满日文化协会进入故宫，用清档、图书编纂出版了《清实录》和《东方国民文库》等。

② 以后又将清快移交给伪满的奉天教育研究所改组为自然科学博物馆。1939年两馆合并为伪满的中央博物馆。

查，当时东北有佛教信徒75万人，回教15万人，基督教9.6万人。^①如何对待宗教群众，不但关系思想统治，也是民族政策上的重要问题。特别如蒙古族，对喇嘛教的信仰极为强烈。据不完全统计，伪满时期，伪兴安各省共有寺庙和教会220处。光是喇嘛就有12000余人。^②这些宗教团体，当时都由协和会进行统制。为此，在组织和活动上，切断同关内宗教团体的联系。典型的例子是东北道院和红卍字会东北主会，1934年被迫宣布与济南总院、北京红卍总会断绝关系，成立伪满洲国总道院和红卍总会。^③

言论文化统治

伪满前期，虽然推行“治安第一主义”，倾注全力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但是并未放弃和忽视文化统治。在组织机构方面，伪满洲国成立时，在资政局内设弘报处，担任“建国和施政精神”的宣传工作。不久，由于日伪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短命的资政局于1932年6月即被撤销，它所承担的宣传业务由伪国务院总务厅秘书处新闻班所继承。之后，出于对国联调查团进行侦察，演出承认伪满洲国、签定《日满议定书》的政治把戏，和向热河地区武力进犯的需要，日伪加强了宣传和情报活动，于1933年2月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新设情报处，它是伪满言论文化的中心统治机关，一元化地管辖新闻、出版、通讯、广播等事业。当然，在它的上面还有关东军。

① 伪满国务院统计处：《第一次满洲国年报》，第337～341页。

② 伪满文教部学务司：《满洲国少数民族教育事情》，1939年8月，第16页。

③ 民国初年道院诞生于山东省，1927年起世界红卍会附设于道院。事变前东北红卍会，在奉天主会之下各地设有分会。

通讯社在宣传舆论机关中处于中枢地位。“九一八”事变前后，我国东北是世界的热点地区，多方舆论关注，各国通讯社林立。中国和西方国家的通讯社姑且不论，光是日本的通讯社就有两家，即：电报通讯社，简称电通；新闻联合社，简称联合。此外还有《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等报社。为竞相报道“九一八”事变真相和事变后东北的真实情况，各通讯报导机关增派大批人员，记者云集。特别是国联调查团在我国东北进行调查期间，沦陷后的中国东北，尤其南满成了国际信报的中心市场。这种局面当然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掩盖其血腥的侵略罪行。1931年12月，日本联合社专务理事岩永裕吉即秉承关东军意旨，提出了“一国一通讯社”和建立“满蒙通讯社”的主张。而建立“满蒙通讯社”的方案，是以充分利用日本电通和联合两社在东北的机构为基础的。1932年10月19日关东军嘱托里见甫在东京与日本两家通讯社总社交涉后签定契约，规定新成立的通讯社将继承电通、联合两社的通讯发行权、通讯设施和在职社员。1932年12月1日，通讯社正式成立时，名称由原拟的“满蒙通社”改为“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社。但它却直接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1933年4月1日才开始形式地受伪满政府的监督。国通社实质上是日本通讯社在伪满所设的分支机构。这种关系，4年后又以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1937年4月12日，伪满国通社与日本同盟（国通社成立后日本原有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签定的协定中包含有这样的条款：国通社人员到日本系同盟社人员，同盟社人员到伪满系国通社人员，两社人员按所在地区受两社领导，从事业务；国通社在伪满发表的新闻，拿到日本或其它外国算作同盟社的新闻，反之同盟社在日本发表的新闻，发到伪满就变成了国通社的新闻。可见，国通社与同盟社乃异名同体，干的是一种勾当。国

通社在伪满处于垄断地位，它建立了囊括全伪满的新闻报导网。1935年秋，关东军为进行“高度言论统制”，以其报导班为核心，筹划设立了满洲弘报协会。国通社成了该会的首要会员。

弘报协会的成员，除独家新闻社国通社外，还包容了当时伪满的一些主要中外报纸。确切地说，弘报协会乃是日伪当局对报界进行一番扫荡的产物。《出版法》公布后，日伪当局虽然可以用宪警对报刊进行检查和取缔，但是光靠这种消极办法还不能完全达到控制言论的目的。可是对报刊又不能像通讯社那样实行“一国一通讯社主义”。办法只有通过强化统制以控制报刊动向。

据伪满国务院统计，到1933年2月末，东北共有中文报纸27种，日文报纸11种，俄文报纸10种，英文报纸3种，计51种；按办报主体计算：中国人办22种，日本人办18种，俄国人办3种，波兰人办1种，犹太人办3种，英国人办1种，美国人办1种。^①不过，各种报纸究竟为哪个国家、集团或势力服务，既不能看文种，也不取决于承办人的国籍。下面即将提及的东北大报《盛京日报》，固系中文报纸，但它始终是以日本帝国主义最大侵华机构满铁为背景的。又如，事变后东北新出现的7种报纸中，除英文报纸1种外，均为日本人所办，7种中有5种是日文报纸。另外，在日本直接统治的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还有大批期刊发行，其发行范围也不限于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②因此，无论从

① 伪满国务院统计处，《第一次满洲国年报》，第330～334页。该统计，既有讹误又有遗漏。如朝鲜文报纸即未统计在内。

② 据伪满国务院统计处《第一次满洲国年报》第334页载，至1931年12月，关东州、附属地发行年刊40种，3.3万份；月刊148种，33.5万份；周刊11种，2.6万份；日刊57种，25.7万份；不定期刊4种，2.5万份；计260种，67.7万份。

哪一方面说，事变后的东北报界，日本势力是占上风的，但却没有控制全局。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在东北经营着大量报纸，而且就发行量而言，中文报纸占绝对优势，日文报纸发行量甚至还不如俄文报纸。^①这种状况虽然不能完全说明日本言论界当时在东北的地位，但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说得上是达到了“高度言论统制”。

伪满言论统制总枢纽是关东军报道班。根据该班策划，伪满政府于1936年4月9日公布的关于设立满洲弘报协会的第51号敕令规定，满洲弘报协会投资并经营新闻、通讯和出版事业，而这种投资和经营都是从统制目的出发的。根据敕令，国通社等8家通讯、新闻社的过半数股票被满洲弘报协会所持有，从而成为满洲弘报协会的加盟者。至于满洲弘报协会本身的资本，则来自伪满洲国、满铁和满洲电信电话会社，但以前二者为主。^②满铁之所以在满洲弘报协会成立时成为主要出资者，原因在于，满铁在东北的日本宣传舆论事业中处于执牛耳的地位，所以满铁的雄厚实力继续被利用，以统制全伪满的新闻事业。为此，满铁不但投资，而且派长期替满铁经营宣传舆论机关的原日本陆军中将高柳保太郎出任满洲弘报协会的第一任理事长。^③高柳上任不久即与伪满国务院弘报处签定备忘录：弘报协会是伪满政府重要事项代行发布机关。^④

① 1933年初，中文报纸发行量为55万份，日文报纸为6930份，俄文报纸为2.5万份。

② 伪满政府占70.8%，满铁占23%，满洲电占5%，其它占1.2%。弘报协会还每年接受满铁、关东军和伪满的补助金。

③ 高柳保太郎，加贺的金泽藩士，先后参加青岛和西伯利亚出兵，是俄国通兼中国通。1924年接管满铁弘报事务，成为《满洲日日新闻》监督将军。在满铁享受理事待遇。

④ 满洲国通信社：《国通十年史》，1942年12月，第55～56页。

再从加盟的国通社以外的7家报社来看：日文报纸有3家，其中《满洲日日新闻》系满铁创办并与满铁同龄的所谓“满洲唯一大报纸”；《大新京日报》原称《大满蒙》报，事变后归《满洲日日新闻》经营；《哈尔滨日日新闻》，1922年创办，1926年就被满铁收买了经营权；中文报纸有两家：《盛京时报》，1906年由中岛真雄在奉天满铁附属地创办，发行量大，常与上海《申报》争高低，1920年满铁给予补助，1925年改为股份公司后，35万元资本中满铁出资20万元；《大同报》是事变后在伪都新京新办的中文报纸。朝鲜文报纸1种，即《满鲜日报》，它也是1906年创办的。至于英文报纸《每日新闻》，则是由《满洲日日新闻》的英文版独立而成的，它也是地道的满铁报纸。此外，这7家加联报纸中，《满洲日日新闻》在沈阳发行《奉天日日新闻》；《盛京日报》在哈尔滨发行《大北新报》。这样，满洲弘报协会就把包括国通社在内的10家主要通讯、新闻机构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另外，哈尔滨俄文报纸《哈尔滨时代》，也被吸收为准加盟报纸。

其他报纸，特别是缺乏资金和后台的小报，事变后纷纷倒闭，有的还公然遭受日伪迫害，被勒令取消。事例之一就是，1927年关俊彦在延边龙井创办的鲜、汉文报《民声报》，事变后即被迫停刊。到了1936年9月29日弘报协会成立时，不过是把日本势力，特别是满铁的舆论机关集中起来，变分别称霸为集中主宰，以左右通讯和新闻。然而，这只是向新闻界开刀之始；满洲弘报协会的成立被称为伪满洲国的第一次新闻整理。

弘报协会作为统制会社，统一支配各通讯社和报社。就连报纸和新闻的制作材料都由协会统一分配。每月一次的社长会议讨论经营、编辑方针。随时召开的协会经营、编辑部门负责人会议

则进行业务联系与统制。全局性新闻，特别是所谓非常时期，必须“顺应国策”进行协调。各加盟社的代表被囑任为弘报协会的参与。在参与会议上，国通社社长任会长，关东军报导班、伪满洲国弘报机关、伪满军事机关和协和会代表出席，讨论新闻检查、取缔和言论、宣传统制等问题，其决议由各社贯彻执行。

伪满第一部言论文化专制法令是《出版法》，它早在伪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出笼之前，1932年10月24日即已公布实行。《出版法》所称的出版物，是“指以出售散布之目的用机械化化学方法复制之文书图书”，包括报纸、杂志和普通出版物。日本帝国主义惟恐各种出版物的发行危及其占领和殖民统治，乃在《出版法》中规定了8种“不得掲載”的事项，诸如：“变革”伪满“组织大纲”，“危害”伪满“存在之基础”，“外交或军事之机密”，“波及国交上重大影响”，等等。《出版法》还规定，伪满国务总理大臣随时得以“有障碍”于外交、军事或财政，抑或“维持治安”的需要为由，禁止或限制报纸、杂志的新闻报导。从此，日伪当局便向出版物大开杀戒，或被禁止发行，或被禁止出口，或被禁止输入。1932年上半年，就有600余万册图书被焚毁。1934年6月一次即有30余种报刊被禁止进口。在《出版法》抛出之前，1932年9月12日还公布了《治安警察法》，它不仅取消了人民群众集会结社的自由，而且剥夺了人们从事文化活动的权力。从此，如果有谁在街道、公共场所张贴标语、传单、图画，或散布、朗颂其它文字，伪警便以“扰乱秩序”的罪名予以禁止或扣留。特别是，各种出版物的检查和取缔也开始由警宪来进行。

文艺界的奋斗牺牲

新闻、出版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文艺的。一般新闻报导和政论文章，容易检查和取缔，而形象思维的文艺，其主题和思想倾向往往是隐讳曲折的。在伪满的前半期，日伪当局对于民族和进步的文艺，除以殖民主义文艺和用行政手段进行检查取缔外，还由军警直接进行法西斯镇压。因此，文艺界所受的统治甚为残酷。

事变前，在东北的文学界中，日本的俳句、短歌和川柳等有一定的发展。事变后，在东北的文学活动中，不但日本人新人辈出，而且文学社团丛生。诸如：《满洲浪漫》集团、作文发行所的《作文》集团、诗刊《鹤》集团等。此外，短歌团体的大连“亚细亚”、“合萌”，新京的“满洲歌人”，哈尔滨的“北满歌”，川柳团体“新京”的吟社“长春”，等等。文学现象是比较复杂的，日本人在我国东北的文学活动，特别是事变前的文学活动，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人还是深受进步文学影响的。然而，事变后日本人的文学活动骤然活跃起来并不是偶然的，纵然不应全加否定，许多日本人文学社团和期刊也显然是推行殖民主义文学和妄图控制伪满文学活动的。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治安第一主义”、全力镇压抗日力量，而伪满政府又无法直接干预文艺的情况下，日本文艺社团实际上是起着统治文艺界的作用的。

东北人民的民族文学活动，遭受事变炮火的严重摧残，一时间，报刊几乎全部停办，文坛呈现死寂状态。伪满洲国出笼后，报刊适应扩大宣传的需要逐步复刊，中国人的文学活动也随之缓

慢复苏。最初出现的文学社团，是沈阳、抚顺一带的“四大社团”，即：冷雾社、飘零社、新社、白光社。这些社团都是先由极少数人个别活动，逐步地寄附于报纸的副刊。继这些社团之后，寒寂社、曦虹社、白云社、白眼社、凋叶社、新潮社、孤雾社、红叶社、野狗社、ABC社、寒光社、凄风社等也先后建立。在北满还有下面即将述及的口琴社、星星剧团以及平凡社、L·S（鲁迅）文学研究社等。诚然，有些社团有名无实，只是昙花一现，社团的构成者，情况也不一致。但是，从总体上说，它反映了文艺界的不屈和奋斗。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在伪满初期，报纸副刊是进行文艺斗争的主要阵地。尽管许多报纸都已沦为日伪的宣传工具，日伪当局的检查取缔亦颇严酷，文学社团和文人作家仍能巧妙地加以利用，躲开日伪的文化罗网。1932年，身任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杨靖宇同志就曾指示党内作家，团结文学青年，创办报纸副刊，占领文学阵地。《哈尔滨新报》副刊“新潮”，是东北沦陷后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所掌握的第一个副刊，它发表了若干倾向性鲜明的文学作品。萧红的《王阿嫂之死》就是其中之一，它展示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所造成的社会关系剧烈变动。1932年夏天的松花江大水冲垮了报馆，“新潮”停办。此后，不息的党员作家罗烽、姜椿芳、金剑啸、舒群等人又同进步作家萧军、萧红等一起，利用关系，于1933年8月6日在日伪官办报纸《大同报》上创办了“夜哨”文艺周刊，影响很大。其发刊词《生命的力》，大胆地号召青年勿须彷徨、踌躇和随波逐流，而要起来“以自己为武器去斗争”。同时，它也委曲婉转地抨击了“王道”、“大同”、“日满协和”、“共存共荣”之类的谎言与鬼话。“夜哨”相继发表许多倾向进步的文艺作品。思想内容由浅到深，人物描写从忍受宰割，到怒目

以对，再到起而斗争。正是由于“夜哨”发表了较为暴露的作品，最后遭到监视、取缔，被迫停刊。代之而起的又有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周刊。该刊直截了当地批驳了以“有目的的文学”自称的歌功颂德文学，并不顾白色恐怖，发表了一系列革命的、进步的文艺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荡、人民挣扎和不屈的反抗精神。“文艺”周刊团结吸引了许多新的文学青年，影响深广。后期的“文艺”周刊，还曾发表高尔基的《夜店》和尼采的田园诗。可与“文艺”周刊相媲美的，是《黑龙江民报》副刊“芜田”。1935年，金剑啸的那篇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兴安岭的风雪》，就是发表在“芜田”上的。诗中描述了32名转战于风雪弥漫的兴安岭的抗日军战士，在一次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14人为国捐躯，其余18人“爬过了死亡”的威胁，信誓继承先烈遗志继续前进。诗篇热情讴歌的是抗日武装的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斗争，而呻吟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人民，从这气壮山河的诗篇中却受到了莫大的精神鼓舞。

伪满初期，日伪当局对于文艺作品，利用殖民主义文艺进行挤压，或以行政力量进行检查、取缔，而对于文艺工作者，主要还是从政治角度进行迫害和镇压。首先发生的是星星剧团事件，亦称牵牛房事件。1933年7月，在上海的30年代革命文艺浪潮影响下，金剑啸、罗烽、舒群、萧军、萧红、白朗等人在哈尔滨创建了半公开的抗日剧团——星星剧团。目的是为了团结左翼文化人，扩大宣传阵地，争夺报刊阵地，抨击汉奸文艺，进行抗日宣传。为此，金剑啸等经常在萧军、萧红的家和牵牛房议事。牵牛房是画家冯咏秋、黄田的家，院内多种牵牛花，故得名。剧团先后演出了美国进步剧《居住二楼的人》、白薇的独幕剧《娘姨》、白涛的独幕剧《一代不如一代》等。金剑啸、姜椿芳、罗烽、萧军等利用《大同报》副

刊“夜哨”，也是在这个时候。引起日伪警宪注意后，1934年秋，剧团成员被捕，剧团被迫解散。由于白色恐怖袭来，文艺活动暂又趋于低沉。

此后，萧军、萧红、罗烽、白朗、舒兰、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人，因环境日趋恶化，难以坚持斗争，于1935年前后，陆续逃入关内。他们虽脱离了这块灾难的土地，却继续为这块土地摆脱灾难而奋斗。譬如，当时即蜚声文坛，如今仍为国内外文学界所肯定、赞扬的萧军、萧红的合集《跋涉》，及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虽然出版于上海，但却是东北这块土地培养的，作家起笔于东北，作品所展现的也是东北沦陷区的生活。当然，也还有更多的文人作家继续留在东北，诸如金剑啸、梁山丁、陈堤、袁犀、田贲、王秋萤、石军、关沫南、但娣、梅娘、吴瑛、田兵、姜灵菲等。他们在日伪的法西斯高压下，以笔墨为刀枪坚持奋斗。有的人，竟以生命和头颅在万恶的敌人面前，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尊严、自豪与伟大。

面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掀起新的高潮，从1935年起，以关东宪兵队为最大阎王殿的日伪警宪机关，开始实行以镇压反满抗日组织与活动为主要目标的所谓“思想对策”。知识界和文艺界人士，越来越多地被列入黑名单。如前所述，继南满的安东救国会事件、沈阳共荣事件之后，1936年6月13日，日本宪兵队又制造了黑龙江民报社事件，即所谓“六一三”事件。这是一场主要以左翼文化人为目标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战士金剑啸壮烈牺牲、姜椿芳被捕入狱。10个月后，1937年4月13日，又有哈尔滨口琴社事件发生，酿成新的流血牺牲。

1935年4月，德商孔氏洋行为推销真善美口琴，招聘口琴教员，应聘者共青团员、邮局工作者袁亚成，在姜椿芳、金剑啸、

任震英等人支持下，创办哈尔滨口琴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1935年底，该社在哈尔滨闹市区巴拉斯电影院成功地举行一次口琴音乐大会，由袁亚成亲自指挥演奏了俄罗斯民歌《伏尔加船夫曲》，最后的压场戏是大合奏《沈阳月》，协奏曲以悲壮丰盈的节奏弦律变化，再现了“九一八”事变之夜日军袭击北大营的凶暴情景，使与会者感到无比的凄怆悲愤。音乐会接连三天暴满，口琴社从此名震哈埠，自然也引起敌人的高度警觉。1936年初，金剑啸与姜椿芳商定接办“大北新报画刊”，口琴社队员纷纷协助集资和书写诗文。“画刊”也曾以轻松的笔调发表了一些进步作品和苏联木刻，等等。由于这些，在“六一三”事件中，“画刊”遭日本领事馆警察查封，金剑啸、姜椿芳被捕。此后口琴社处境更加危险，队员常被跟踪。但口琴社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为避开敌人监视，口琴社的活动改在太阳岛，还曾在碧波荡漾的松花江上举行大联欢，船上飘扬着哈尔滨口琴社旅行团的旗帜，队员们合奏着《快乐的农夫》曲。1936年10月17、18日两天，突然又在巴拉斯电影院举行第二届口琴音乐大会。这就更加触怒了日伪警宪。已经上了黑名单的袁亚成，闻知警宪即将进行大逮捕，乃与妻子陈涓匆匆离哈赴沪。口琴社的其他12名队员却未能逃脱毒手。大逮捕发生在1937年4月13日。有关无关的人都受株连。最后，积极、热情、为口琴社出了大力的侯小古惨遭极刑。

遭受白色恐怖摧残的东北文艺界，消沉一二年后，至伪满中期又以新的姿态投入战斗。文艺界的不屈的斗争表明，确实像鲁迅为萧红的名篇《生死场》所写的序言中所说：侵略者可能征服这块土地，但永远不能征服人们的灵魂。